

范丽珠 谢遐龄 刘芳 主编

乡土的力量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
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范丽珠
谢遐龄
刘芳
主编

乡土的力量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
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的力量: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范丽珠,谢遐龄,刘芳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1789-1

I. ①乡… II. ①范…②谢…③刘… III. ①农村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849号

责任编辑 孙瑜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乡土的力量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

范丽珠 谢遐龄 刘芳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89-1/C·446

定价 35.00 元

前 言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较早地进入农耕时代,于是乡土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特色。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中国人经历的路程,就是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国经历的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变化,无不将乡村社会的人与事卷入急速变迁中。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与持续,都离不开与乡村的互动,这使我们认识中国乡土的力量具有相当的社会学价值。本书既包括了对中国乡村与现代化过程各方面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观察研究,同时也吸收了地方实践者的具体而又丰富的经验,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的发展。

当年费孝通通过对乡村的深入观察,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①,摆脱贫困、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望,成就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乡村一波又一波的努力。在本书中,范丽珠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在河北与浙江南部乡村发展的丰富的例子,不仅有类似小岗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冲破制度限制大胆地进行分田到户的故事,也有在改革过程中,尝试改变生产方式,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民的生活日益富足起来的事例。或许正是这些自发的追求“好日子”的冲动、自发的组织能力以及那些自发产生的地方领袖,才构成了中国发展奇迹的最基本的因素,实现了费孝通先生毕生追求的“志在富民”的心愿。

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①。而这样的过程在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乡土特性相关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上层政治结构互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费孝通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经忧虑现代化带给中国乡村生活的“损蚀”^②,因为注意到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变革带给乡土社会原有结构全面的冲击。这种变革在 20 世纪不断地持续,被很多社会学家描述过的存在于传统民间社会“自治空间”也难免受到现代体制的侵扰,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普遍的推行,更对乡村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陈纳通过对在苏北某地人民公社中干群关系的研究,发现尽管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改变了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但就农村社区的文化制度而言,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仍是传统农村直接的延续和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农村社区的文化制度,人们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基本方式与社会变革以前并无实质性区别。从而提出“文化(制度)迭变”的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当社会结构性制度发生变化以后,其文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延续,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演变以适应新的现实。故而我们需要认识在“文化迭变”过程中仍然延续的那些传统,并认识在迭变中未曾消失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② 参阅费孝通:《乡土重建》,“损蚀冲洗下的乡土”,收入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的传统与现代的衔接问题,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一个飞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竟然会伴随着各种各样传统的复兴,而这些传统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几十年现代化实践的助力。

本书中所涉及的经验研究,都在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的传统不仅并未消逝,而且无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抑或民间已经开始小康、乃至积累相当财富的时候,都始终存在着。事实上,民间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渐渐地从日益宽松的社会氛围以及经济成长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信,从而使得那些潜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日渐复苏甚至寻找新的空间。蔺朝国、杜学德、孔令德、陈定模、刘芳、聂家听等人所分享的经验恰恰说明了,乡村传统如何在经济发展中被激活,并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经验报告让我们了解到,现代社会中传统仪式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一方面有助于在经济活跃、社会变迁中使关系平衡起来,维持社会的内聚性并防止社会崩溃;另一方面也使得民间社会的精神“原乡”借助共同的社会网络、共同的信仰仪式以及对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获得存在的理由。尽管,现代的政治制度已经渗透到基层社会,但是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如家族制度、关系与信任在资源动员、解决地方问题、与正式制度的互动中,仍然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家族制度与地域关系,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以及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并非否定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的影响力。实际上,过去三十多年的种种变化,都是中国乡土力量对于由上而下发动改革的积极回应。在认识乡土中国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人们发现基层领袖或称地方能人(包括乡村干部、宗族中德高望众者、庙会的组织者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基本特征是或受过教育、或做过基层政府的官员、或有某些经商经验,对于国家政策有所了解同时也是民间所信赖的人,故能够成为国家权力与乡村基层之间的媒介,从而使得民间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着缓冲地带。在经济领域,民间自发组织的合作性质生产和贸易组织,在本土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得到地方政府的

协助,有可能出现双赢的结果;而在宗族组织与民间信仰组织的恢复中,也出现了国家权力不再是一种相对立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地被人们认识之后,很多原来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传统,也得到了人们的保护。

正是因为各地方在现代化实践中根据其地域性社会资本,进行自我调适与创造,本书中涉及的从无到有的农民城“龙港”,到处都体现着那些曾经的农民在这座全新城市中的经济创造力;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赞皇村,通过掌握核桃苗的嫁接技术,村民们摆脱了贫困,并且以文明生活为新的目标,比如该村的村民公约中,明确规定了丧事与喜事的操办规模和方式,既保留了传统的仪式性,同时也避免大操大办浪费钱财。

当然,当乡村的发展与现代化接轨以后,无疑是走上了一个难以用传统经验来操纵的快速轨道,乡村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乐天对联民村的研究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民们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本事”,曾经是人们应对大自然的生存性智慧,却在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中,让农民们被迫选择了与传统的决裂。中国的乡村生产已经普遍形成了对农作物新品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依赖,这种依赖又有力地促进了新技术的引进;同时,中国传统的和土地的亲近中积累的经验智慧却被人们无奈地放弃,今天民众生活中面临的食品安全以及中国农业安全问题却不是一家一户能够解决的事情。实际上,大量新的问题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出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如何照顾研究的村民在如何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时面对的困境,陈林对农村信用合作问题的关注,都涉及了发展中的问题与民众传统的处事方式、交往网络与信任关系等受到的极大挑战。

必须承认,市场经济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乡土社会,原来世代聚居同一村庄的村民们也都流动起来,因此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以及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关联状况。如果说,20世纪初期以

来的现代制度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渗透,却没有完全改变世代生活在农民心中的传统,而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则毫不留情地颠覆着乡土社会的精神传统和信任体系。谢遐龄在本书中提出,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同样的,赵文词在其研究中也关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尽管乡土中国是中国传统的原乡,但是剧烈的社会变迁不断地瓦解着传统和来自传统的各种社会资本与价值。此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则是来自现代性的挑战,当我们谈论乡土的力量时,实际上确认了来自传统的那些因素对于社会变迁与经济进步之间的某种关联,不单纯来自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对于合作的需要。“中国传统不再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神圣的、美好的东西而为人所拥抱,而是基于工具的、实用的考虑,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而为人们选择利用。”^①

其实,今天的乡土中国早已经被视为是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由于发展是个持续性的主题,社会各方面如何产生良性互动则对中国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范丽珠

^① 金耀基:《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目 录

前 言	范丽珠	1
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	谢遐龄	1
传统的延续：人民公社制度下干群关系的再探讨	陈 纳	13
中国传统乡村民间文化根脉在现代社会的踵续与升华 ——以河北省磁县北贾壁乡北贾壁村龙凤山文化 景区发展为例	简朝国 简九章	47
河北省武安市固义村社火傩戏及其演出组织与传承动力	杜学德	54
关于民间恢复蔺相如墓地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孔令德	62
乡村天主教皈依者的“人观”及其实践过程 ——基于冀中大南赵村的田野考察	聂家昕	69
社会学视野下的宗族与仪式：以华北宗族为例的实证研究	刘 芳	82
共同体、社区关系与农民集体行动 ——瑞安地区赵宅村的污染事件及其解决	何 煦	109

生存性智慧、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张乐天 陆 洋	124
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扬弃	陈定模	134
试述平民慈善与民间基金会的发展策略	郑超豪 林晓清	141
宗族性组织与城市现代化契合		
——以温州市龙港镇为例	陈文芭	151
我国农村信用社及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与改革	陈 林	159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文化遗产：中国合法性道德基础的变迁		
..... 赵文词(Richard Madsen)		192
乡土的力量：从河北、浙江南部地区的田野调查中观察中国		
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范丽珠	208
后 记		228
作者名单		229

重建意义世界： 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哪个是首要？即所谓解决之另两个就随之解决或至少可顺利解决，不解决之另两个就无法解决。论者多曰：农业。经济是中心，一了百了。经济找到出路，其他的怎么都有办法。成功的范例是甘肃定西。以“富民”为毕生心愿的费孝通先生，于垂暮之年亲往调研多次，找到一个适合当地水土的土豆品种，让这个贫困县富了起来。又有论者曰：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重新成为土地私有者。这种思路可归之为农村：是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或曰农村社会结构。笔者以为，这种思路过于简单。若真的恢复土地私有，那个结局是大多数甚或绝大多数农民都会变卖私有土地，离土进城。农村问题转化为农民问题——为何如此说？农民自己的解决思路就是进城打工，把自身转化为农民工；农民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农民问题为三农之首。

笔者经过初步调研，目前的认识是：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但不以土地为核心问题。三农问题首要是重建中国农村；而重建中国农村的核心在于重建意义世界。

一、农村问题为首要

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历史上是以土

地改革和重组农村社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决议,全面总结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全面制定了做好农村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所谓农村问题,确切的表述应是农村社会问题。建设新农村,核心应是重建农村社会。然而,建设新农村多半被解读为农村硬件建设,成为七通一平、拆房子盖房子之类的工作。各地竞相展示花园式农宅,城里人多自叹不及,恨不能立即迁往农村当个新农民。劳民伤财,未得要领。

在这里,简略回顾一下中国农村的演变情况。传统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社会。尽管历代都设保甲,但其功能主要是监控、协助完税(钱粮),并不具备组织农村社会的职责。担当组织农村社会功能的主要是三种势力,一是宗族组织。二是神道体系。中国农村的神道体系相当复杂且原始,祖宗崇拜、原始巫术、山川木石狸狢蛇鼠五通淫祠与佛道高级宗教并存相资。三是乡绅体现的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但这种势力多半实现为民间自治形态。乡绅不以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官员身份活动,而是作为小区领袖受到小区成员普遍尊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农村调查,写成一篇相当出色的人类学论文,里面讲到的学田,可以看作乡绅势力的实体性表达。情况一般是,为了让小区子弟读书,将来赴国家考试出仕,由乡绅出面集资兴学。所收集的资金建学堂所余,购田出租,以租金充办学经费,是即学田。乡绅及出资者组成管理机构。以今日眼光看,此即所谓公益性社会组织。毛泽东视为一种“集体地主”占有方式。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作为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被没收。

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妨视为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指的是没有一个组织程度很高的庞大团体按照某种系统的理论和设计好的方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推行社会变革,而是任其自然自发地随波逐流。尽管乡绅是退休或丁忧官员按国家意识形态行事,但仍是

作为民间力量行民间之事，不是作为政府代表。尽管宋朝以后多有儒生赴乡间开展小区建设活动，以明代为盛，但终归分散而组织性不甚强，属民间自发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赣南地区（以瑞金为首府）实施建国试验，其中重要项目是农村小区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验打破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自然的生长状态，开始了大规模自觉重建社会结构的时代。这虽来自俄国革命的启示，却是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而这社会主义运动源自“资产阶级的”法国革命——黑格尔说，法国革命开启了头足倒立的纪元：思想在先。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实施的是思想在先原则。社会是要改造的——改造一词自此进入了意义世界的主流。

二、土地问题为何不能成为解决农村问题之核心？

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结构表现形态之一。土地私有化在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农民、农业问题。实施重分土地，其结局不过是大部分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完成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的过渡方式。本节要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土地所有情况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这个“深层”意义，在此基础上论证土地问题不是解决农村社会结构问题的核心。

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私有化。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得到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而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中，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土地从农民私有变为集体所有。这一过渡十分顺利、和平，农民表现得相当配合，简直是奇迹！这是怎样实现的？

要对土地改革的实际进程作社会学研究才能理解这个秘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党领导一支军队夺得土地后再分给农民那种“恩赐”作法。党先要用理论武装群众，告诉农民革命道理。这是让农民群众了解自己行为之意义。同时，在村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并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共）等外围组

织。换句话说,这是党组织的一种扩大。思想、组织的基础打好后,开始斗争地主土豪并重新分地分产。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把斗争策略、步骤交给群众,领导群众实施斗争的方针。特别强调让群众在自身斗争实践中学习政策和策略,强调让群众通过自身经验体会党的正确性。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政权、经济关系、社会组织被彻底粉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新生产关系与新社会组织建构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党组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核心。不是党建构了一种新社会而党在这个社会之上、之外,而是党把自身扩大为社会,党在这个社会之中并担当其核心。党组织、外围群众组织、全体村民,组织一步步地扩大,滚雪球似地一层层地裹起来。一个基层支部扩大并发展成一个小区(共同体)。党组织与小区是一体,不是党组织在小区之外,而是党组织与小区是一个事物。由于自始至终都是党组织作为核心在教育、组织、动员、指导群众,亲手领导群众,还十分注重让参与的群众随时随处体验党主张的理论、政策与策略之正确,因而在这种新产生的结构中,党的领导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土地改革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不是以单个原子式的个体农民为独立单元的自耕农社会——像许多研究者以为土地私有达成的结构方式那样,党组织与农民结成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土地的私有并不彻底、完全,而是有限度的私有。我用“公有制下的私有”表述这种所有制。

这就意味着,无论宣布土地归谁所有,当代中国社会土地关系之实质——党与农民之间的伦理关系——仍是决定一切的。如果实施土地私有——任农民变卖、失去土地——其社会后果是割断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

其实,无论谁买到土地,也并非土地的完全私有者。如果他是个农业经营者,归他所有的土地就只有供耕作的五寸许深。即使解放初经土地改革归属农民的土地,也只有这么深——国家规定:土层以下的全部矿藏、财宝等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

起始就不是土地的完全所有者。

总之，土地改革一方面实施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私有化，一方面结成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二者中，后者是根基，也是实质。任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路和方案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土地所有情况从来不是实质之所在，企图从此入手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误以为土地是实质所在。

三、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为社会之必不可少前提

既然三农问题首要在农村，而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村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结构不在土地所有——那么，重建农村社会在于什么？我的回答是：在于意义世界。本节先讲意义世界之地位与意义。

改革开放从意义世界入手。邓小平一开口就讲拨乱反正。何谓拨乱反正？按邓小平讲法，叫做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是非。邓小平主政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概念。他的讲法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社会主义概念之内涵，也属调整意义世界。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重要争论：义利之争。论者曰：过去是义在利先，现在要改为利在义先。倡此论者之所重，也在意义世界，其企图是让意义世界中的利在义先原则取代义在利先原则。

这场争论影响甚大，对改革开放起了误导作用，流毒至今。

笔者一直认为，义在利先不能取消或降格，代之以利在义先。本人从1985年至今反复阐明，义永远在先。拨乱反正是改变义之内涵而已，义在利先须坚持不懈；绝不是让利居于义之前。

社会怎样成其为社会？社会通过各个自由意志之互动建构。这种互动是有意义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互动不可能脱离意义。社会之建构源于各个自由意志之带有意义的互动。意义又在意义世界中。因而社会之成为社会，意义世界是前提，而且是基本前提。

由利在义先原则风行天下始，中国社会的意义世界根基受到破

坏。一个社会的健康,基本前提是人人皆诚敬。诚则对他人的行为可以预测其反应。敬则人们的一切行为皆遵守规则,皆不会冒犯他人,把自己意愿强加于人。由于利在义先已经风行天下,人们不再以诚敬为第一原则。党的基本路线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遂有学者解释为“一切向钱看”。本人从80年代后期就反复阐明,“经济建设”概念至少有三重含义:最浅层次的,是社会产品、服务之总量;生产关系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等);一切经济行为的规范体系(比如借债应如期归还、无理由退货制度)、经济活动内涵的精神(比如商业精神)。第三方面已经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可见在社会生活中,“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不可割裂的。经济建设本身就内含着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

制度以及组成制度的各项规则,均须由意义世界守护。纵有制度、法律法规在,行为者仍违规、犯罪不断,社会不成其为社会矣!意义世界依之建构社会,意义世界依之维护社会。意义世界是社会之前提。

四、中国农村意义世界现状

由于理论上、执政上均未重视意义世界,社会结构与制度两个方面呈严重迟滞状况。农村情况更为严重。

前述旧中国与农村社会结构相关的意义世界主要有三种势力:宗族、神道体系、乡绅。大致说来,宗族对应祖宗崇拜,神道体系则是多神、泛神、巫术、佛道等的混杂物,乡绅则体现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着力铲除上述三种势力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社会结构(含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巨变,意义世界更是巨变。

毛泽东时代,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小区取代了旧日单个家族或若干家族联合组成的农村小区,在意识形态上强调“组织高于一切”。甚至养老问题都训示:你们(指子女)不必顾虑老人将来没人养,组

织上会为你们考虑的。那时对政府的能力极具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无限政府理念形成于这种缺少论证的信心。既然党组织有这样的担当，民众自然乐于卸掉自古以来承担的养老责任。此例可以帮助了解解放初期新型小区摧毁旧式小区的力量所在。

“对组织忠诚老实”取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鼓励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对方不符合党的利益、党的指示的言行。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批判“封建迷信”。告诉民众，无须害怕地狱，因为那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编造出来麻痹、毒害人民以利巩固其统治的谎言。这一步骤影响深远，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农民的思想。从此农民再也不怕死后下地狱受罚，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效建立起对党组织、党的领袖的崇拜。家家堂屋悬挂毛泽东像。“孝顺”、“承顺颜色”转变为“听党的话”。

在毛泽东时代，意义世界的转换相当迅速且有效，而且张力巨大，到“文化大革命”，新意识形态达到顶峰，领袖崇拜达到巅峰。总体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显现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倾向。中国社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了毛泽东一句话的解释而开战的现象——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决非孤证。或许一种理性宗教正在成形。

不过必须指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理性化倾向并不那么明显，可见农民的思想稳定性较强。相对城市，文化传统也是农村保存较多。

改革开放在文化趋向上是从小理性主义返回中国传统。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文化上不是趋向西方化，而是远离西方化——如果揭示西方化内涵是理性主义化的话。

改革开放虽然从农村开始，但很快主战场转向城市。农村被搁置了。农民大批离乡离土，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机会。农村社会几近解体。离乡离土的农民大多是青壮年，其中有许多人是党员。这样，一些农村的党组织瘫痪了。社会结构的坍塌导致农村社会意义世界遭受到比城市更严重的破坏。意义世界中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萎缩，留下的空间须有填补者：一是祖宗崇拜以及传统礼仪制度中